

文学对话的深度

张梦阳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是中华读书报著名文学记者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待读了该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着“为什么”。

她向写出《白鹿原》的大作家陈忠实发问: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关于“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话,“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

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就是在索问中国这个“有着特殊记忆的民族,他们怎样脱下长袍?为什么要脱下长袍?他们怎样剪去那长长的辫子?为什么要剪去那长长的辫子?”

舒晋瑜紧接着得出了结论:正是在这种追问性的构思和主人公白嘉轩娶了六个老婆都死了的故事架构中,呈现出《白鹿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

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这些追问“为什么”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所以使这部书达到了少见的“深度”。

既是文学访谈,当然要突出文学性。舒晋瑜与毕飞宇的对话正是在探究文学的“之所以然”。

毕飞宇在我心目中是极具艺术品质,最懂得文学的当代作家,他最好的作品是《平原》,并不是获得茅奖的《推拿》。这可能与评奖的时间性有关。舒晋瑜似乎跟我的艺术感觉相通,问毕飞宇道:“以往获得茅奖的作品,多是宏大叙事,但《推拿》不算是。”

这样一问,引出了毕飞宇极为精辟的回答:“我非常热爱宏大,但问题是对宏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所谓史诗模式是宏大,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小的,跟叙事者内心的宏大几乎无关,真正的宏大是留在人物的内部。内部的宏大是非常惊人的。”“从我写作开始,兴奋点就在内部而不是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部。写一个小说,写战争,写来写去都是外部不涉内心、不涉及感受,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王安忆评价迟子建的时候,说:‘她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每个写作的人都知道‘在哪儿’,因为这个判断,导致每个作家不一样,我所理解的宏大,永远在内部。”

“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其实就是懂得文学。文学在哪儿?就在人的心里。题材再大,写世界大战,写了很多战争过程,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曲折命运。就不算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军事战术学,而是要生动、深刻、鲜活地写人,写人的心灵,是由语言构成的人与心的形象画。这实质是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弄不清楚,到死还在概念化的泥潭里瞎折腾。虽然其中有人著作等身,声名显赫,但到头来不过留下一堆垃圾。最后,烟消云散,除了做反面教材之外,一点儿痕迹都留不下。

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无法归纳成概念”。正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文学与概念无缘。

一位哲人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理解了文学的“之所以然”,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儿?才能实现文学的自觉。王安忆、迟子建和毕飞宇都应该归属这一类作家,而舒晋瑜能够和她(他)们对话,就因为她也属于这一类懂得文学“在哪儿”的记者和作家。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对文学的理解达到了惊人的“深度”,是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对话。

“深度”不是因为你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多么锋芒毕露,而是说,你具有充足底气、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能引发作者的深度思考,拓展相关的话题。舒晋瑜面对采访对象,都怀有尊重和深入的理解并善于提出问题。所以她也同样受到这些一流大作家的敬重与欢迎。

【编辑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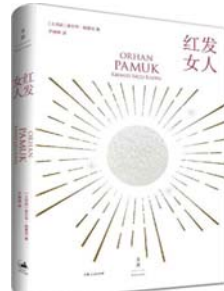
《古中国的爱情与战争:〈诗经〉的回响》
王士元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择取了《诗经》中二十几首有代表性的诗歌,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人的情感生活——爱情;二是关注上古时代的国家政事——战争。作者在诗歌中搜寻,借助诗中的点滴线索,配合考古发现,为读者描绘出中国上古时代人类生活图景的两个侧面。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美]何宛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访谈了华尔街压力重重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用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他们的使命是创造股东价值,然而他们的做法和假设却会产生危机。刺破了抽象的、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揭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



《红发女人》
[土耳其]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去父亲,做了挖井学徒的少年杰姆,与挖井师傅马哈茂德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杰姆和红发女人的相遇,变成了一口让他一生不得安宁的井。多年以后他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商人,平静的生活下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去。终于有一天,他试图遗忘的往事将他吞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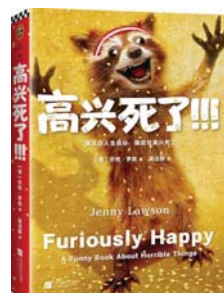
《雨》
[马来西亚]黄锦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离开故土下南洋的一个小家庭,栖身并扎根于马来半岛胶林间,四周环伺着凶猛的野兽,怀有异心的外人及徘徊不散的亡灵……作者参照在故乡的生活经验,承接以往几近于失传的“异史”,经营一个幻魅的历史叙事学,以文学的方式使人重新审视过去,叩问未来。



《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
孙郁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高人、逸人、至人、超人”,这是季羨林先生对张中行先生的评价。张中行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作者从自己与张中行先生交往中的感性印象出发,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勾勒出这位有故事的老人的丰富一生。



《高兴死了!!!》
[美]珍妮·罗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作者集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症、暴躁症、睡眠障碍等一系列精神病于一身,本书是她在精神状态尚可时,用独特的诙谐风格对周遭的生活所做出的记录。她用搞怪的语言讲述自己与抑郁症斗争的真实经历,鼓励身处低谷的人们走出困境。

他本身就是一首诗

刘陆星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笔下的《自由与爱情》恐怕算得上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歌了。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同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称他“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之后,除了与裴多菲同属19世纪的奥朗尼和20世纪初的尤热夫之外,对匈牙利诗歌和诗人的译介并未能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这本苏契·盖佐的诗文集《忧伤坐在树墩上》。

苏契·盖佐是匈牙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和政治家。说实话,即使不写诗,他丰富跌宕的生活阅历本身就是一首诗,更何况他不仅写诗,而且是一名风格独具的诗人。看看他这首诗就能窥豹一斑了:“她穿着鹿皮鞋/无影无体,无声无息/但能够感觉到她跑过/这秋日的草原/尽管她有脚/但从不沾地。”(《好诗》)如此具象的空灵,让人在读过之后会忍不住轻轻屏住呼吸。

苏契·盖佐1953年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特尔古穆列什。特兰西瓦尼亚在历史上曾是属于匈牙利王国的一个公国,一战后被割给了罗马尼亚,后来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成为一个特殊的省份,匈裔、德裔和罗马尼亚人的混居地。作为传说中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和狼人的故乡,这里的历史同样充满了阴郁和血腥。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桥段在这里真实上演。由于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上百万匈族人连同他们的家乡被划归罗马尼亚治下,年轻的苏契·盖佐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名为《反点》的地下刊物,用文字争取自由,可以说与裴多菲的呼喊一脉相承。这使



《忧伤坐在树墩上》
[匈牙利]苏契·盖佐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他多次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拘捕和迫害,甚至受到自己父亲的监视。三十年后,他于2012年解禁的档案中得知,自己的父亲曾迫于秘密警察的淫威,成为告密者,定期报告自己儿子的言行,回首往事,令人脊寒。谁又能说,他的父亲不是另一种时代的受难者呢?“忧伤也坐在了一个树墩上/摇着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等着伤感的大眼睛望着寒天/坐在树墩上眺望周围的一切/瑟瑟发抖……”言为心声,这恐怕正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然而,即使此时,即便“现在院子里泛着莹莹的绿,雪的周遭寒冷地闪烁”,诗人仍然充满希望——“冬季也自己温暖自己”。(《忧伤坐在树墩上》)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值得一提的是苏契·盖佐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对中国发展的关注。他在匈牙利率先提出了“打开东大门”的概念,是内阁中高度重视与中国关系的领导人之一。他频繁出访中国,不仅在政治、贸易领域,而且在文化、知识领域也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甚至将女儿送到中国学习中医。他对中国的热爱也体现在他的诗歌中:《一位宇航员的日记摘抄》中对李白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法第普西克里》是专为参加中国的文学活动创作的;《关于葡萄、野鹅和一口井》则是他写给他的一位中国友人的。

苏契·盖佐曾说:“对世界的认知存在着一个包含了对未来事物了解的神秘内核,然而人类忘记了抵达它的通道。然而有的时候,出于偶然,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与这种深层知识相通的关系,我们称这种关系为‘直觉’。我想,正是这种与世界相通的直觉关系决定了他诗歌艺术的特殊气质。”